

#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 社会行为的 影响

清  
华

传

播

译

丛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 著

肖志军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 社会行为的 影响

清  
华

传

播

译

丛

一美一  
肖志军 译  
约书亚·梅罗维茨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为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传播学教授。该书 1985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 年获美国广播者协会和广播教育协会的最佳电子媒介图书奖,以及语言传播协会的年度图书金奖,被译成日、法等多种文字出版。

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创造出了新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重新塑造行为的程度远远超越了它所传递的具体信息。本书着重研究了新的信息流动模式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作者继承了场景理论和媒介理论,提出了将面对面的交往研究与媒介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切入点:社会“场景”结构。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机制是:角色表演的社会舞台进行了重新组合,并由此带来了人们对“恰当行为”观念的改变。

全书内容丰富,文笔流畅。适合广大传播界的师生、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阅读。

中文书名: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原著书名: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Copyright © 1985 by Joshua Meyrowitz

First published in 1985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为清华大学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0-145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清华传播译丛/熊澄宇主编)

ISBN 7-302-05295-6

I. 消… II. ①梅… ②肖… III. 电子技术—传播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研究 IV. 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8198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16 印张:23.5 字数:359 千字

版次: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302-05295-6/G·251

印数:0001~3000

定价:35.00 元



## 清华传播译丛

主 编：熊澄宇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 鸿

张国良

明安香

胡正荣

胡苏薇

郭庆光

熊澄宇



传播学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1997年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传播学素有“多学科的交叉路口”之称,构成其学术渊源的学科主要为行为科学群中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语言学、符号学和信息科学群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学、统计学等。

自传播学诞生以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传播实践活动密不可分。随着计算机、有线电视、光纤传输、卫星直播、数字电影、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等新传播形态的不断出现,传播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为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推动文理交叉的相关学科发展,清华大学于1998年成立了传播系。在传播系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与不同国家从事传播学教学、科研和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接触了许多国外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研究生教学中我们也有选择地部分使用了国外的原版教材。

考虑到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和社会需求,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愿望,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将选择一批国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国际通行的传播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大致包

括传播者研究、传播媒介研究、受众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过程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传播制度研究、认识论方法论研究等八个方面。清华传播译丛的选题将主要围绕这八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媒体社会是继信息社会后的又一说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介与信息传播活动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希望我们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推动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进程,也希望读者能对我们工作中的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帮助我们完善这样一种努力。

熊澄宇

2001年10月

# 原著前言

1963年11月24日，涉嫌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被杰克·鲁比(Jack Ruby)枪杀。无数的美国人看到了枪杀事件的电视直播。那些在电视上看到该事件的人们可能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这场谋杀，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睹是“第一手的”。无论你是否完全赞同，电视上看到了就等同于“第一手”的经历，但是从整体上看，电视和电子媒介显然极大地改变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

长期以来，亲身参与是“第一手”经历的先决条件。例如，为了在办公室看到总统并听他讲话，你必须同他一起呆在办公室。假如你在报纸上读了他的演说，或者听了当时在场的其他人的叙述，那么你所看到或听到的信息至多是第二手的。现场播出的与有中介的传播从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媒介的演化降低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现在人们可以在不亲身参与的情况下就能观看社会表演；人们可以不必在同一个地方会面就能“直接”交流。物质结构曾经将我们的社会分隔成许多用于交流的空间环境，因此这些有形的空间结构大大地降低了其社会重要程度。例如，家中房屋的墙不再是将家庭同大的社区或社会完全隔离开的有效屏障。家中的房间是限制较小的独特环境，因为家庭成员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电话接触到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他们有这种

接触能力。

即使在家庭中,媒介也改变了个人房间的社会重要程度。以前,父母能够将孩子关到他们自己的房间,对他们进行管教,这是一种限制社会交往的手段。但是如今,假如孩子的房间通过电视、收音机、电话和电脑与外面的世界相连,这种行为就会有全新的含义。

临近的区域、建筑物和房间在身体上、感情上和精神上限制着人们,过去传统上一直如此。如今物质围成的空间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因为信息可以跨越围墙,到达遥远的地方。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地方与他的知识或经历越来越不相关。电子媒介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意义。当然,亲身参与和直接的感官接触仍然是最基本的经验形式。由高墙和大门所确定的社会空间只是交往环境的一个类型。如果安装有镜头、麦克风或电话,巨大的城堡的高墙也不能真正造就完全隔离的社会环境。

而且在我们国家中,电子媒介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有形环境中。每一户美国家庭几乎都至少拥有一部电话和一台电视。在这个国家,收音机的数量超过人口的数量。即使是犯人和靠福利救济的家庭也都认为电子媒介是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每个家庭平均每周开电视的时间是50个小时。我们的总统们使用并排的几台电视,这样他们可以同时监视三大新闻网所有的广播。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在牢房里靠一台电视陪伴着度日。电脑正在进入所有的社会环境中,从儿童的卧室到公司董事会的办公室莫不如此。电子媒介以各种方式将地域和经历同化,并且已经成为连接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基础,不论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如何。

与监狱类似,女修道院、家中的房屋、临近地区、行政人员的套房、大学校园和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都充满了电子信息,我们对社会、当局和自己的认识肯定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呢?其中部分的问题是,仅仅描述电子媒介出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合,就需进一步地询问,以前较为封闭的社会场合是怎样影响社会交往方式的呢?如果不能了解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如何影响到行为方式,我们就不会知道当这种限制消失或发生变化后所造成的后果。

为了研究社会传播新模式的影响,本书采用了“场景”方法来研究媒介和行为。社会学家很早就指出,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



会有不同的举止,会受到所在的地方和参加者的影响。这种方法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在某个既定场景中的行为也会受到“他不在某个地方”和“某个人不在场”的影响。场景的方法本来是研究界限和限制的,然而大多数的社会学家认为某个社会的社会场景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场景通常是用有形的空间划分的,如地域、房间、建筑物等等。这里所提出的理论将静态场景的研究扩展到变化场景的研究,将有形场景的分析扩展到对媒介传播形成的社会环境的分析。

本书描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所看到的其他人的角色。这些角色越来越多地展示给新的观众,展示在“观众”不亲身参与的舞台,展示在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舞台”。本书研究了个体和群体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里所提出的场景分析描述了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密切的联系。已经证实,社会环境在群体身份、角色变化以及等级社会的地位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项研究描述了,当我们失去旧的“地点观念”后,如何获得恰当的社会行为观念和新的身份观念。本书认为行为环境的变化,是过去30年许多潮流、事件和运动的共同原因。书中分析的内容是新媒体所造成的新环境,或者称之为“信息系统”。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对社会的变化或我们当今社会的特征作出一个完整的解释,而是为了说明媒介的变化与当今社会的潮流有着莫大的因果关系,这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像。本书更进一步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影响和社会变革的新方法,不仅能研究现在,而且能研究过去和将来。

本书首先提出了媒介、场景和行为三者关系的一般原理,然后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了“印刷场景”转移到“电子场景”后潜在的影响。最后是三个个案研究,详细描述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成人和儿童以及政治英雄的观念的变化。第一章介绍了主要的论点和研究方法,最后一章归纳了理论,并探讨了它对未来的意义。附录部分讨论了主要的观点及其内在的联系。

本书适合于一般的读者、学者和某些专业的学生。不同的读者可能希望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读完第一章后,有的人可能就跳到个案研究的那一章,然后再阅读前面的各章,看看理论是怎样提出

的。虽然个案研究是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我尽量使它们独立成章。考虑到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我将脚注分成两大类,每一页下方的脚注为通常的评述、例子以及研究和调查的统计数据,这些对一般的读者都有兴趣。大量的学术性参考文献、证明和注释都放在书末的注解部分。

当电视在我家附近流行起来时,我的父母坚决拒绝“盲目”购买这个新“玩具”。父母的这种做法无意间使我开始思考本书所涉及到的问题。当我们买电视时,我们所认识的家庭几乎都有了电视,但是我的父母仍然坚持认为“它们还很不完善”(因为这个原因,我的父母至今还没有买彩电)。幸运的是,最后我们买了一台“柠檬”牌的大型落地电视,屏幕前面有门(可以看成是收音机),这样可以调整我父母的恐惧。电视机好的时间同坏的时间几乎一样多,我的父母从不急着去修理。

当我是孩子时,有时可以看电视,有时不能,这使我能敏锐地看出看电视和不看电视的孩子对世界的看法有何不同。虽然当时我没有多少思考,但是我认为电视好像是“秘密展示机”,它将我不知道的成人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对电视的初始反应既不是模仿我所看到的行为,也不是受到诱惑,想拥有众多的广告产品。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社会交往的信息,影响到我是否愿意接受别人的行为和表面价值。电视使我和朋友有了某些方面的成人认识,不再允许父母随意采用传统的父母行为方式。它也影响了我对异性、老师、警察、政治家以及其他“权威”的看法。与大多数电视节目的内容一样愚弄人的是,电视对陌生人或地方的特写镜头式的展示,影响了我对所认识的人或遇到的人的社会行为的评价。电视改变了我家中墙的组成方式,限制了我的社会经验。

许多年后,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对分析媒介和人际行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兴趣。我惊奇地发现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完全孤立的。当然,人们观察了媒介如何影响真实的行为,真实的行为如何与媒介的内容相关。然而,未将两个传播系统截然分开,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模型几乎没有。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关注“人们模仿在电视上看到的行为”,或者电视所展示的内容不是现实的确切反映,现实生活与媒介有冲突。很少有人将媒介和人际交往在同一“行为”系统中或“对他人行为响应”系统中进行研究。好像也无人研究社会行为信

息的新的获取模式在如何影响人们扮演旧时角色的能力。

正如第一章所说,我在大学中学到的一些理论框架提示,可能会“组合成”这样的一套理论。在奎因斯大学(Queens College)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我通过比较人际行为规则和电视产品规则之间结构上的共性,首次为媒介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1976年我开始研究本书中的更为宽泛的理论,并且于1978年在纽约大学我的博士论文演讲中提出了最早的雏形(1979年 Microfilm 大学)。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1年开始修改和扩充,终于成为本书。

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曾在其他地方以各种形式出现。第十四章的观点曾出现在1977年的“ET CETERS”,文章的题目是“中部地区政治的兴起”,以及1984年7月《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中的“影视眼中的政治:英雄都去了哪里?”。基于第十三章的会议论文“电视与童年的消失”被收录进1981年文化与传播国际会议的会议录选编第1卷“大众传播与技术研究”,它由萨里·托马斯(Sari Thomas)主编(ABLEX 1984)。从第十三章抽出的一篇文章发表在 DAEDALUS 1984年夏季册,文章的题目是“成人化的儿童与儿童化的成人:电子时代的社会化”。该章内容的一篇短文“孩子们哪里去了?”发表在1982年8月的《新闻周刊》。

许多人为本研究作出了贡献,我想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最大的帮助来自于我的同事,他们对部分的甚至是全部的书稿进行了阅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简·阿尔伯荷恩(Jan Alberghene),拉里·巴伦(Larry Baron),比尔·比曼(Bill Beeman),约翰·凯利(John Kelly),汤姆·库奇曼(Tom Kochman),杰克·兰纳曼(Jack Lannmann),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on),希拉·麦克纳米(Sheila McNamee),鲍勃·门内尔(Bob Mennel),埃德·瓦施特尔(Ed Wachtel)和马克·韦斯特(Mark West)都给予了极为有用的评论和建议。我同心理学家卡罗琳·麦伯特(Carolyn Mebert)的争论帮助完善了第十三章的观点。我也要特别感谢德维·利里(Devid Leary)对书稿的阅读和评论,这使我在“文字处理”时得心应手。他是一位热心的同事,在许多方面给了我大量的支持,不胜枚举。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苏珊·兰比尼尔(Susan Rabiner)编辑提出的建议很有独到之处,她对本工作非常热心。乔安妮·霍兰兹

(Joanne Hollands), 拉斯·拉韦松(Russ Lawson)和托马斯·扎克(Thomas Zack)是我的研究助理,他们在搜集书籍和文章时比我更有耐心。新罕布什尔大学戴蒙德图书馆和它的馆际借阅办公室的员工对我们的各种要求都鼎力相助。我的三位学生,卡连·赖施(Karen Reisch)、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和塔德·阿克曼(Tad Ackman),他们批判性的文章和对许多有趣的参考文献的深入探索,丰富了这项研究。劳拉·李·伦纳德(Laura Lee Leonard),朗达·曼(Rhonda Mann),贝丝·奥热霍夫斯基(Beth Orzechowsk)和罗斯玛丽·托马斯(Rosemarie Thomas)帮助进行校对。还有许多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不能忘记,在我写这本书的8年中,他们提供的思路、文献和观点使本书更加完善。由于人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本书研究的最后阶段得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研究办公室的中央大学研究基金的支持,以及该大学研究生院夏季学院奖学金的赞助。斯图尔德·帕尔默(Stuart Palmer)校长和系负责人威尔伯恩(Wilburn)和琼·布朗(Jean Brown)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对完成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为我营造了一种富有创造力和成长的工作环境。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康迪斯·勒蒙纳德(Candice Lemonard)和女儿让娜(Janna),她们给了我关爱和支持,使我认识到人和写作的重要性。康迪斯给了我具体的批评和建议,以及大量的资料和想法。让娜出生在我完成最后一稿的紧张时期,她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情感和体验,这是我从前所不能理解的。康迪斯和让娜一起,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给了我地域和永恒的感觉。

# 目 录

新社会风景  
——从印刷场景到电子场景

引言	1
第一部分 作为变化原理的媒介	10
一、媒介和行为：被疏忽的关联	10
二、媒介、场景和行为	31
三、媒介变化时角色为什么会改变	48
第二部分 从印刷场景到电子场景	65
四、公共场景的融合	67
五、公开和私下行为的模糊	87
六、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分离	109
第三部分 新的社会风景	121
七、新的群体身份	123
八、“成为”的新方法	142
九、质疑权威	151
十、影响圈	164
第四部分 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	176
十一、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群体身份变化的 个案研究	177

十二、成年和童年的模糊——角色转换的个案研究 .....	216
十三、政治英雄降为普通百姓——权威变化的个案 研究 .....	258
第五部分 结论 .....	297
十四、我们去过哪儿,我们将去何方 .....	297
附录: 名词术语讨论 .....	321
参考文献 .....	332

# 引 言

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我还是名大学生时，我曾在欧洲度过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暑假。在那里我有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新体验。当我返回家后，我开始将这些经历与我的朋友、家人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人分享。但是我并没有千篇一律地向每个人讲述完全相同的旅行故事。例如，我的父母听到的是我留宿的旅店如何的安全和干净，旅行是怎样使我不再挑食；而我的朋友们所听到的故事则充满危机、冒险，并带有某些浪漫；我的教授听到的是旅行的“教育”方面：参观博物馆、教堂和历史名胜，以及对交叉文化不同行为的观察。就这样，我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故事各不相同。

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我还是名大学生时，我曾在欧洲度过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暑假。在那里我有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新体验。当我返回家后，我开始将这些经历与我的朋友、家人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人分享。但是我并没有千篇一律地向每个人讲述完全相同的旅行故事。例如，我的父母听到的是我留宿的旅店如何的安全和干净，旅行是怎样使我不再挑食；而我的朋友们所听到的故事则充满危机、冒险，并带有某些浪漫；我的教授听到的是旅行的“教育”方面：参观博物馆、教堂和历史名胜，以及对交叉文化不同行为的观察。就这样，我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故事各不相同。

我的旅行故事不仅在内容上有变化，而且其风格也各不相同。每个故事中俚语的数量不同，语法结构和发音也不一样。而且讲话速度、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手势在每种情况下也不相同。每一次的描述都是真实与夸张的独特的结合。例如，我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中充满了浮夸的语言和讽刺。

那么我是否对其中某些人“撒谎”了呢？并不是。我只不过是告诉了他们不同的事实。而我所做的其实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交往中所做的，我突出了自己的个性和经历的某些方面，而掩盖了其他方面。

在旅行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这种变化的特征。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我”，行为方式总是大体相同。而现在我意识到，过去我仅仅是关注了在不同场景中自己行

为中的相同地方,关注在特定场景中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整体的限制。例如,我考虑到了在研讨会中自己可能的发言范围,但是没有注意到,作为一名学生,是不能站出来引导讨论的(就像现在一样,作为一名教授,我不能在课堂上保持沉默,面无表情)。我没有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对我来说安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是正常的(例如听一场宗教布道),而在其他场合中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怪异的或有敌意的(譬如同朋友一起吃饭时)。虽然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会在不同的场合中无意识地改变了行为方式,但是我认为(为了与当时人们的情调一致)那些“演戏”的人要么不诚实,要么没有接触到“真实的自我”。

此后的一个学期,在我熟悉了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著作之后,我对行为规则和社会交往方式的理解总的来说发生了变化。戈夫曼将社会生活描述成一出多幕的戏剧。在戏剧中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是根据所处的环境、我们在其中的特定角色以及观众的组成决定的。戈夫曼的著作读起来像人类学,但是他的观察并不注重于奇异的或原始的文化,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行为。戈夫曼让我意识到了通常属于直觉和无意识的观念和行为。他使我意识到某些我已知但自己却无感觉的东西。

虽然戈夫曼为我提供了观察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但是我认为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遗漏了某些东西。在60年代最混乱的时候,用戈夫曼于50年代首次提出的理论框架,就无法解释当时所发生的社会角色的变化。

戈夫曼所展示的社会交往的一般图景是:一个人主动参与到许多不同的剧目中,人们不停地变换身份和角色,学习并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努力维持他们在每个场景的表演,同时不会威胁到他们在其他社会场景中的不同表演。戈夫曼的“社会脚本”表面上看是动态的,但是这种动态需要相应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作基础,即固定的规则、角色、社会背景以及固定的团体。个体必须遵守这些社会传统,必须进行练习和预演并持续他们的表演。当然了,这里的脚本和舞台相对来说不变化。在戈夫曼的社会世界中,动态主要是指人物投影在不变的背景中。人们的行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其变化的方式相应于变化的场



景,通常是不变的。

这种社会生活一成不变的看法与当时的社会时局不符。虽然60年代末期的人们仍然在“扮演角色”,但是他们所扮演角色已不同于以往。用戈夫曼的话来说,“演员们”似乎将他们的表演和交往风格混合起来了。以前在“幕后”的生活,如性和毒品,现在却挤进公众舞台。人们在公众场合的穿着、说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许多记者和学者正在抛弃“客观性”这个公众理念,将他们个人的经验和主观感受倾注在作品中。已有的压力打破了原有的行为和观念的禁锢,以相似的方式对待性别、年龄和职业各不相同的人群。修女们丢掉她们的习惯,从修道院搬到社区。而女秘书们则拒绝再为她们的男上司泡咖啡。同时,一种“青年文化”出现了,它跨越了阶级、种族、宗教信仰,甚至民族界线。孩子们对父母和老师直呼其名,好像他们是同辈人。男性和女性也正在摆脱求爱和结婚的旧套路。美国总统将自己的手术伤疤展示出来,好像全国的人们都是他的亲密朋友。而对政府、政治家和公司又产生了新的不信任。中央集权看来要让位给“社区管理”。在这些以及其他诸多的变化中,戈夫曼曾提出了寻找“演员的最简单模式”,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出演员,将其归类,这样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会有一定之规可循”,这似乎是虚幻的。

我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家是麦克卢汉,他提供了一个可能解释社会行为普遍发生变化的理由,这就是传播媒介的变化。麦克卢汉的著作读起来不像传统的学术分析,而更像叙事诗。不过麦克卢汉以自己的方式预测了60年代末期所发生的行为变化,这比戈夫曼的有效得多。在麦克卢汉1961年和1963年的著作中,他所描绘的情景出现在1967年至1972年的纽约、三藩市、华盛顿以及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城市的街头,这种描绘的准确性令人吃惊。麦克卢汉描述了普遍范围的社会变化:如“重新部落化”,传统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减少,青年、少数民族和其他群体对“进一步”参与的要求以及对远方权威的不信任。长发、胡须、裸体、部落音乐以及反对“当权派”的歌声似乎都应验了麦克卢汉的预言。

麦克卢汉将这些变化归因于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说明电子媒介能够引起广泛社会变化的原理。麦克卢汉将媒介描绘成感官的延伸,并且宣称新媒介进入某种文化后就会改变这种文化下的人们的“感官平衡”,并改变他们的意识。但是麦